

结合视角下高考改革与基础教育 变革的再审视

——兼评《高考改革与基础教育变革》

● 张盈盈

摘要:已有研究很少将高考改革和基础教育变革结合起来思考,对两者间关系的关注度不够。《高考改革与基础教育变革》一书基于一种结合视角来讨论新一轮高考改革下基础教育产生的变革,主张跳出高考和基础教育本身去看教育,从更为广阔的社会视野中寻求突破。这为当前的高考改革研究和基础教育变革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思路,在结合的视角下,我们可以发现应试主义教育与高考“指挥棒”都不是有百害而无一利,而是有自身的价值,因此,关于高考改革与基础教育变革的研究,需要在结合视角下实现“豁然开朗”。

关键词:高考改革;基础教育变革;高考“指挥棒”;应试主义教育;结合视角

高考是基础教育与高等教育之间的衔接点,被视为中小学的“指挥棒”,但高考为什么可以从教育的评价和选拔环节摇身一变成为基础教育的追求?为什么在本科教育环节,国考、考研等无法成为“指挥棒”,而高考偏偏就能成为基础教育的“指挥棒”?怎样才能更加客观理性地审视高考“指挥棒”的作用?既然高考会影响到基础教育的发展变化,那么高考改革与基础教育变革无疑关系密切,该如何看待两者之间的关系?这对推进高考改革与基础教育变革有何启示?对于这些问题,我们还仅仅停留于表面的认知层面,缺乏深层次的追问。然而,只有对高考改革和基础教育变革的这一系列问题有一个全面深入的认识,改革才能迈着坚实的步伐前进,迎向闪光的远方。

一、现有相关研究梳理

(一) 高考改革研究的主要关注点

1977年恢复高考以来,伴随着社会经济的转型发展,高考经历着频繁的改革与变动。尤其在近年来,随着一系列高考相关政策的出台,高考改革的研究热

度呈加速升温的态势。总体来看,目前有关高考改革的研究主要关注以下两点:

1. 公平选才问题

2014年9月,国务院发布的《关于深化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以下简称《实施意见》)明确提出“把促进公平公正作为改革的基本价值取向”,公平选才是社会公众寄予高考的“厚望”,是“高考制度的基本功能和精神之所在”^[1],高考改革的公平性始终是热点话题之一。

高考公平是一个“涉及价值、制度和技术的‘多面相’”^[2]的概念,有学者厘定了高考公平的内涵与属性,澄清了高考公平的本质所在。^[3]高考制度政策改革是彰显高考公平的重中之重,通观现有研究,无论是对异地高考政策的研究^[4],还是对高考加分政策的探讨^[5],抑或是对自主招生考试的分析^[6],研究者们都普遍将公平选才视为焦点。针对现行高考制度存在的弊端,有学者建议以高考招生制度改革总体目标为契机,逐步推进高考招生制度改革,建立以考试内容科学化、考试主体多样化、考试评价合理化、自主招生

张盈盈/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硕士生,主要研究方向为课程与教学论

公正化为理念的,科学性和公平性兼具的、具有中国特色的高考招生制度。^[7]对于高考公平,有少部分学者也有一些不同的观点。如有学者认为高考公平问题产生的直接原因包括教育资源的分配不均、高考制度的设计局限、高考功能的质异性化以及制度系统的协调不足等。^[8]还有学者认为追求公平或许正是高考陷入误区的根源,因为这种公平是社会意义上的公平,而非教育意义上的公平,因而公平在很大程度上成了高考的负担。^[9]总的来说,公平是这部分学者关注的核心问题。

2. 科学选才问题

《实施意见》提出了“体现科学高效,提高选拔水平”的基本原则,在公平选才的基本诉求下,科学选才的呼声同样不绝于耳。实行“两依据一参考”的多元录取机制是新高考改革打破“唯分数论”的主要手段。如何更科学合理地发挥统一考试、学业水平考试及综合素质评价在招生录取中的效用,处理好三者的关系,是学者们基于科学选才这一关注点来研究高考改革的主要内容。大多数学者们对综合素质评价的功能及价值的态度基本一致,认为其“有理论基础、方法策略作为基础和前提”,故可纳入高考体系,“能够成为高考改革的重要方向”^[10]。相关的讨论关键不在于要不要综合评价,而是如何综合评价。在这方面,有学者将研究视线投射到了国外,通过分析借鉴英美^[11]、日韩^[12]等国的招生综合评价机制,从中汲取有益经验,以期深化我国高考招生改革提供启示。

高考科目设置改革也是高考改革的主要内容之一,即使每一次的改革都不乏争议,但我们不能否认推动高考的科学选才是科目改革始终如一的出发点之一。学者们以一种“贯穿古今”的视野对高考科目设置的历史与现实进行了审视。有学者将我国建国以来高考科目设置的演变分为五大阶段——高校单独招考模式、大文大理设科模式、两考并置模式、3+X设科模式、新课程3+X设科模式。^[13]有学者调研了普高生高考选考科目意向及现状,分析了影响学生科目选择的因素,存在的主要问题,并提出了改进策略。^[14]^[15]高考选考科目的赋分机制也引起了学界的关注。有学者建议使用“量表化”方法改进新高考选考科目计分^[16],还有学者提出了“学业质量水平参照划等法”和“考生群体能力参照划等法”的赋分方案^[17]。

高考改革研究中,也有一些学者同时关注到了公平选才与科学选才,探究如何辩证看待、有机平衡高考公平与效益之间的关系。有学者认为高考改革必须首重公平^[18],将来高考改革的发展趋势则是走向公平与效率的兼顾与平衡^[19]。还有学者认为,“从选才的

战略意义分析,效率与公平,应兼容并蓄,相辅相成,相互促进,不能顾此失彼。”^[20]正确处理科学选才的教育功能与促进公平的社会功能的关系关键在于:改革招生计划分配方式,改革高考的形式和内容,改革招生录取体制机制等。^[21]

综而观之,公平选才与科学选才是高考改革历程中始终贯穿着的两条价值取向主线,^[22]是我国高考改革永不褪色的至关要义。但总的来看,以高考为对象的研究,大都是就高考而言高考,对高考可能给基础教育造成的影响缺乏足够的关注。

(二)基础教育变革研究的主要关注点

2001年6月,《国家基础教育课程改革指导纲要》的颁布拉开了我国新一轮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序幕。新课改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教育领域最为广泛和深刻的变革,是实现科教兴国和教育现代化的战略要求,也是建构和完善基础教育课程体系的必然选择。”^[23]十多年来,学者们对基础教育变革的研究与探讨主要关注以下两点:

1. 视理念为实践的风向标

新课改以来,有关基础教育变革理论基础的探讨在学界掀起了“波澜”。一方面,许多学者都将各种新理念作为指导基础教育变革的理论基础。新课改的实质性内容主要体现为介入课改的新课程理念,即以建构主义心理学、后现代主义哲学以及多元智能理论为基础,强调以学生为中心、重视学生的个人经验、强调课程实施过程中的个人经验。^[24]如有学者认为,倡导建构性学习是我国新课改的理念与策略^[25],新课改“明示了素质教育的课程理念”^[26],“我国基础教育的唯一出路就是……从应试主义教育向素质教育的转型”^[27]。近年来,受西方“生活世界”理论的影响,“回归生活世界”的呼声也在学界此起彼伏,成为教育研究领域的一种重要话语。如有学者认为,“回归生活世界是新课程的基本理念之一”^[28],还有学者认为,“学校课程重返生活世界……是当代课程发展的一个重要理念”^[29],还有学者明确提出,“教育必须面向生活世界,教育必须奠基于教学活动参与者的生活世界之中,面向现实生活世界中的人,走进人的现实生活世界。”^[30]随着新课改的推进,生成性教学这一理念在教育领域产生了广泛持久的影响,有学者认为当前的教学变革要实现从预成性思维到生成性思维的转换,^[31]有学者提出“把生成性教学观作为当下教学实践和教学改革的基本教学精神”^[32]。除此之外,还有学者基于新教育理念开展了“新教育实验”,该项实验不但相继提出了“为了一切的人,为了人的一切”、“过一种幸福完整的教育生活”等核心理念,而且逐步构建了以“五

大观点·六大行动·四大改变”为行动逻辑的实践模式。^[33]

另一方面,不少学者针对上述新理念进行了理论反思。有学者反思认为,“由‘应试教育’向素质教育转轨提法的流行,反映了一股‘轻视知识’的教育思潮,干扰教育、课程改革,必须坚决克服”^[34],认为新课改理念存在片面、偏激的错误,它不顾现实的条件和可行性,片面地要高考服从课改是不切实际的空想^[35]。对于“回归生活世界”的理念,有学者反思认为“教育回归生活世界”存在着概念模糊化、目标庸俗化、过程形式化的误区,^[36]还有学者认为,“教育活动不能扔掉知识纯讲‘回归’……而应该……实现对生活世界的‘超越’”^[37],“要想切实解决中国的教学问题,不能依赖于教学向生活世界的回归,而只能通过不断提高教学理论研究和教学实践的科学化水平来实现”^[38]。也有学者对生成性教学理念进行了反思,“‘生成性教学’在理论上还存在自相矛盾之处,其逻辑前提也显得过于理想化……‘生成性教学’不宜作为指导教学工作的方法论”^[39]。而对于“新教育实验”,也有一些学者认为“这种宏大哲学语境式的理论框架,模糊了实验目标、理论基础和实验因子,不能清晰明确地表述实验研究的理论假设”^[40]。

2.对理念在实践中的指导效果的反思

在经历了实践的荡涤之后,理念对于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指导效果如何?这引起了学者们的关注与思考。第一种态度认为虽然新课改过程中产生了不少问题,但改革的大方向没错,用理念指导实践的效果较好,认为理念对指导新课改具有积极作用。如有学者认为“这次课改理念先进,目标鲜明,具有强烈的时代感”^[41]。也有学者认为,新课改背景下,学校的真实教育形态正悄然发生改变,“如校本课程、活动课程、选修课程等理念开始被各个学校广泛接受并付诸实践……合作学习、探究学习、项目学习等更加新颖、更富主体内涵的教育理念在课堂教学活动中体现得日趋明显。”^[42]还有学者认为,“实践证明,随着课程改革的不断深化,德育为先、能力为重、全面发展的素质教育理念已经深入人心,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正在得到落实。可见,本次课程改革的方向和目标是正确的,成效是显著的。”^[43]

第二种态度认为新理念下的基础教育课程改革存在不少问题,用理念指导实践的效果并不好,认为理念对指导新课改具有消极作用,多见于一些一线教师的文章中。如针对新课改的“三维目标”,有教师撰文认为,新课标的“三维目标”存在漏洞百出、逻辑混乱、不便操作的问题。^[44]有学者基于一线教师的反馈

认为,“尽管人们对三维目标所包含的理念与精神赞不绝口,但一线教师对它的评价却是‘模糊’‘笼统’‘太宏观’,在教学实践中或是对它敬而远之,或是机械模仿。”^[45]有教师撰文提到,“实施新课程,接受新理念、新方式,如果没有给教师带来‘新生’,反而使他们陷入更深的无奈和困惑,以致出现了‘穿新鞋走老路’的怪现象。”^[46]还有学者通过对生成性教学改革反思,认为其存在随意性生成、刻意性生成和假意性生成等方面的缺失。^[47]通观已有的关于基础教育变革的研究可以发现,不管是追捧理念本身的人,还是对理念及其指导实践效果进行反思的人,都将目光集中在理念上,认为新课改取决于理念,而未意识到任何理念的效果都需要结合高考这一特殊因素才能有效地分析其作用。

二、两者研究的脱节呼唤相互间的协同观照

审视已有研究,学者们很少将高考改革和基础教育变革结合起来思考,基本上只是就高考而谈高考改革,就基础教育而谈基础教育变革,对两者间关系的关注度不够。虽然很多一线教师都很关注高考和基础教育变革的联系,但他们的关注以经验总结为主,对二者联系的认识也流于表面。在学术界,虽然也有一些学者反思认为“课程改革与高考制度相协调”^[48]“基础教育变革的突破口在于高考的改革”^[49]等,但这些观点并不多见,且缺乏影响力。因此,可以说,关于高考改革和基础教育变革的研究,目前还处于各自“独善其身”的状态,而两方面的研究也各有各的思路和逻辑,各自为营,基本“零互动”。

(一)研究双方缺少“互动”的原因及其影响

正是在这种各自为营的研究氛围下,不少人认为课程改革就是要强调观念的变革,甚至认为课程改革就等同于观念变革,甚至排斥将对高考的关注纳入进来。比如教育部基础教育司组织编写的《走进新课程——与课程实施者对话》一书就直言:“……教育的理念和追求才是决定我们教育行为的前提……考试改革并不能解决课程改革中的问题,也不是决定课程改革成败的决定性因素。真正影响和解决本次课程改革所有问题的关键,是观念……。”^[50]新课改伊始,人们希望通过新课改来淡化甚至根除应试教育问题,然而若干年后,反观现实不难发现,许多教师即使在思想层面认同新理念,但是当将理念落实到教学实践中时,“穿新鞋走老路”的现象却悄然滋生蔓延,片面应试依旧泛滥。

实际上,“观念的转变是一个有深度的过程,人们不可能通过对概念的把握,通过灌输或强加某些概念

就完成教师观念的转变,并一劳永逸地用这种观念去指导其行为。”^[5]基础教育变革不是单单做到理念落地就可以实现的,而是必须“眼观六路,耳听八方”,同时觉察实践的进程才行。在笔者看来,课程改革停滞于理念层面的高呼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身处一线教学现场教师群体的“知”与“行”在事实上的相背离,也是当前研究双方缺少“互动”的主因之一。单一的理念推广导致当下新课改基本上是跟随理念而动,而没有充分考虑到这些理念在高考“指挥棒”的制约下到底有多大的实行空间。一些新理念虽然“深入人心”,但是碍于高考的影响,基础教育要切实在这些理念的“照耀”下“茁壮成长”实则也是困难重重。这么一来,改革便如同纸上谈兵,流于形式,进而将直接影响到改革终极目标的达成。

虽然新课改高举着新理念的大旗,试图对一线教师进行“观念启蒙”,但是高考的“分数导向”牵制了这一启蒙的完成,“多考一分干掉千人”成为学生开足马力全力追逐分数的巨大动力,故而有学者称新课改为“尚未完成的教育启蒙”^[6]。这也使改革的新理念在学术界被热烈议论着,在实践中却很难引起共鸣,深陷“表面迎合,实质遇冷”的尴尬境地。所以,新课改的“发力”在很大程度上是受限的。“高考改革‘牛鼻子’牵动教改‘牛身子’”^[7]的现象,以及新高考背景下的走班制教学、分层教学等都可以是高考改革主导基础教育变革在现实中活生生的印证。所以说,当新课改搞得轰轰烈烈,而应试主义教育在高考“指挥棒”的笼罩下却被抓得扎扎实实时,让基础教育变革先于高考改革以助其前行是不现实的。因此,“考试不改,课程改革寸步难行”就不能说是杞人忧天。

正是受片面强调理念以及“基础教育变革应走在高考改革前面”观点的影响,即使秉持着多元理念的新课改以“先行者”的姿态在几乎不顾及高考改革步伐的情况下展开了高调的“自我修复”,但少了高考改革的应和与配合,基础教育变革只能唱“独角戏”,这也致使高考改革长期滞后于基础教育变革。在这样的形势下,高考改革和基础教育变革之路就必然会荆棘丛生、崎岖坎坷。

综观已有研究,在高考改革研究方面,公平选才和科学选才是两大关注点,基于这两点的高考改革研究基本上是围绕着高考本身,而较少考虑到基础教育;在基础教育变革研究方面也基本上都是单一地从理念切入来透视基础教育变革,只是就理念本身而谈理念,研究囿于基础教育范围之内,而未考虑到高考这一影响因素。这就使笔者不禁困惑,人们高调地谈论着高考的“指挥棒”作用,但当谈论聚焦于基础教育

变革时,却对高考这一“指挥棒”熟视无睹;人们“义正辞严”地批判着高考“指挥棒”对基础教育的“荼毒”,但当谈论视点集中于高考改革时,却对基础教育不闻不问。研究者们至多“不痛不痒”地强调着两者的关系,但并没有将研究的视野再往前投射一点,将高考改革和基础教育变革同时纳入改革思索的范畴,建立两方面研究的相互关联机制,探寻高考和基础教育协同照应的改革并进路径。

(二)两者的研究亟须结合进行

当高考改革和新课改各不相谋、相对割裂时,不管对哪方来说,改革都犹如是在沉重脚链的束缚下蹒跚前进,举步维艰。因此,在高考“指挥棒”的影响下,基础教育变革无法脱离高考改革而“擅自行事”。周序博士撰写的《高考改革与基础教育变革》一书为我们更好地理解和研究高考改革与基础教育变革提供了一些别样洞见和有益参考,具有积极的启示意义。在本书中作者提到:“在经历了‘素质教育’与‘新课程改革’两次轰轰烈烈的‘教育革命’之后,我们逐渐认识到,我国基础教育的关键不在于课堂教学的理念要转变,而在于高考导向和教学理念必须一致。”^[8]换言之,作者实际上就是在强调“新课改需要和高考改革相协调”^[9]。

既然是“协调”,那就不能只顾自身,而是必然要考虑到其余因素的动态变化。进一步来说,两者的这种“协调”需要有一个“度”,而这个“度”实际上就存在于社会系统中。因为高考改革与基础教育变革尽管发生在教育领域,但它们远非仅是教育问题,而是社会问题在考试和课堂教学两个环节中的反映,其根源在社会,实质是社会问题。无论是高考改革还是基础教育变革,它们其实都是庞大的社会变革体系中的一个子系统,作用于、也受制于社会系统。将高考改革与基础教育变革结合起来,将这两者与其他子系统结合起来才能恰如其分地把控好教育改革的这个“度”,高考改革与基础教育变革才能在合理的“度”中实现灵活的动态平衡。因此,高考改革与基础教育变革“相协调”实则是作者将高考改革和基础教育变革都放置于社会这个大背景中,基于一种结合的视角来审视高考改革与基础教育变革而捕捉到的。

作者对高考改革与基础教育变革相结合的强调并没有落入前人的“经验性”“浅层次”的怪圈中,而是将目光投射至更广大处来思考教育改革问题,关注到了高考改革与基础教育变革在社会系统中的动态运作,从而收获了更为广阔的社会视野的洞察。其实,这种从社会切入的结合视角正是建立在纯粹的教育视角基础之上的。从纯粹的教育视角出发,作者看到

了高考改革与基础教育变革过程中显现出来的种种现象与问题,正是因为有这些认知打底,作者才能更进一步,从社会的结合视角切入来探究高考改革与基础教育变革,观测教育的视界于是更加清晰、深刻。教育是一种文化活动,特定的文化脉络和具体情境必然深刻地影响着教育的改革和发展。^[6]高考改革与基础教育变革与当前我国诸多领域的社会改革一样,如果不考虑社会这一大环境而只靠“系统内部改革”是难以成功的,只有考虑到独自的子系统外的各种复杂因素改革才有可能接近胜利的曙光。

当高考改革和新课改在实施中面临诸多挑战而“进退两难”时,我们不妨将两者共同置于改革的逻辑框架中去思索,在实践中相互关注,这样的话改革便可能多了一份“柳暗花明”的希望。据此,高考改革和基础教育变革不能“各自为战”,高考改革研究和基础教育变革研究亟须结合进行,跳出高考和基础教育本身去看教育,从更为广阔的社会视野中寻求突破,对高考改革与基础教育变革展开更深入的探析与寻觅。将高考改革和基础教育变革同时纳入观照体系,遥相呼应着进行改革,从而使高考改革和基础教育变革能够实现方向契合,步调统一,协同并进,这既是深化研究的有益之举也是推进改革的内在需求。

三、结合审视之下的“豁然开朗”

当高考改革研究与基础教育变革研究始终都只是自顾自的独立体时,人们只能是从各自单独的研究小窗口探出去来管窥某些现象与问题,视域的狭窄容易“一叶障目”,使评判不够辨证、客观、真切,这无疑不利于研究的科学推进。然而,当我们试着变换一下思路,扭转一下视线时,或许能够“豁然开朗”,在不经意间拥有新的发现。

(一)应试主义教育的再认识

众所周知,应试主义教育一直以来都饱受诟病,人们只是看到了应试主义教育下呈现出来的种种“劣迹”,便将“压抑学生个性”“固化学生思维”“泯灭学生创造力”等帽子扣到了应试主义教育的头上。实际上,这种对应试主义教育的价值判断并没有考虑到其存在的大背景和环境,就给应试主义教育判了“死刑”,更遑论得出的结论如何了。

《高考改革与基础教育变革》一书认为,“应试主义教育是以高考为代表的考试评价制度的产物,它与高考相伴而生,难以割裂。”^[7]既然如此,那么我们在评判应试主义教育时,就有充分的理由和必要将高考纳入到评判应试主义教育的逻辑中来,基于大的社会背景将应试主义教育与高考结合起来看待。有人认

为应试主义教育产生的根源是高考,故主张取消高考,然而不得不承认的是,目前还没有哪一种更好的人才选拔机制能全面替代现有高考制度,从实际情况来看,现有高考制度仍是目前最能适配于现实的一种人才选拔机制。因此,即使高考存在种种弊端,但它的积极作用是更需要被关注到以及被赋予价值意义的。

既然高考不能取消,“分数面前人人平等”仍旧是目前人们对高考的“信仰所在”,那么当人们都在全力追逐分数的时候,应试主义教育现象的出现就不可避免了。故就现状来看,应试主义教育是必然会依附于高考制度之上的。《高考改革与基础教育变革》一书认为,“实际上,应试主义教育是在重人情、关系的社会中尽可能地维护社会公平的产物,是人们为了修补社会诚信缺失对教育选拔的冲击而采取的措施,是高度甚至过度重视教育在促进社会纵向流动中作用的传统影响下的结果……虽然它有着种种弊端,但在新的、更好的教育模式出现之前,应试主义教育至少能够崇尚‘分数面前人人平等’的高考制度相匹配,最大限度地维护社会的公平和稳定。”^[8]这其实就是作者基于社会学之下的结合视角,将应试主义教育置于社会这个庞大系统中并且结合高考制度去考察而看到的应试主义教育“鲜为人知”的积极一面——虽然应试主义教育是机械的、残酷的、死板的,但是它却符合学生在高考这一人才选拔制度下追求分数时内心考上大学的终极愿望,而我们又必须承认,在达成这一目标的过程中,应试主义教育展现了很大的有效性。固然应试主义教育对于学生来说的这一层意义是十分功利的,但是这并不能抹杀这一意义的正当性。所以应试主义教育并不是一个有弊无益、十恶不赦的教育模式,它不过是在没有更有效的人才选拔方式时的一个无可奈何的选择而已。^[9]

诚然,我们无法否认应试主义教育具有“阴暗面”,但是我们不能就此而忽视了它同样具有的“光亮面”,而简单片面地认为它罪大恶极,必须消除,只有将应试主义教育放置到社会系统中并且结合高考来看待,才能捕捉到它在当前形势下具有的积极意义,我们对应试主义教育的价值判断才更能够站得住脚。

(二)高考“指挥棒”的再审视

一提到高考“指挥棒”,多数人都会对其“嗤之以鼻”,人们将其消极影响作为抨击它的依据。客观来说,高考对基础教育造成的种种负面导向功能的确产生了一系列的消极效果,在一定程度上钳制了基础教育的健康发展,但是,不应忽视的是,高考这一“指挥

棒”同样具有积极的一面。

2014年开始,以高考改革为核心的招生考试制度迎来全新的“2.0时代”^[6]。众所周知,“选择性”是新高考最大的一个亮点,新高考的文理不分科给予了学生相较于从前很大的自主选科权。那么,是什么主导着学生的自主选择?已有不少调查研究表明,成绩是影响学生选择高考科目的首要因素。换言之,学生最有可能选择能让自己取得高分的那些科目。显然,新高考给予学生的自主权仍然没有离开分数这一框架。其实这一结果是意料之中的,只要考高分、上大学仍然是学生的追求,那么学生的科目选择受高考“指挥棒”的引导便是理所应当、无须苛责的了。

虽然从表面上来看,学生选择高考科目仍然受制于分数,但是一般来说,学生能考高分的科目也是他们比较感兴趣的,因此在这个过程中,成绩和兴趣在一定程度上其实是匹配的。所以当分数是影响学生选择高考科目的首要因素时,兴趣其实也已经不为人知地暗含其中了。虽然不管在以前还是现在,学生都同样处在高考的“指挥棒”下,但是以前文理分科时高考“指挥棒”往往只能打压兴趣,而现在文理分科之后,这一“指挥棒”便能将指向一转,转至兼顾学生兴趣的道路上。和以前文理分科时不自主的硬性选择相比,新高考的这一改革举措可谓是一个很大的进步。如此看来,新一轮高考改革并非为消除高考的“指挥棒”作用,而恰是旗帜鲜明、实实在在地利用了高考的“指挥棒”效应。这也是高考“指挥棒”好好“指挥”而对基础教育发挥正积极作用的一个鲜明实例。

因此,当高考“指挥棒”被新高考运用自如而展现出其优势时,高考“指挥棒”的积极意义便在不自觉中显现了出来。诚如《高考改革与基础教育变革》一书中作者说的那样:“高考‘指挥棒’绝非有百弊而无一利,而是也可以发挥出积极的、调节基础教育发展方向的作用。视高考‘指挥棒’为洪水猛兽,将教育改革失败的原因全都推到高考‘指挥棒’身上,其实是不公允也是不客观的。”^[6]高考制度在可预见的未来还将保留,那么高考“指挥棒”就必然不会消失,而是一种客观存在。所以,我们需要做的不是想方设法去避免高考的“指挥棒”作用,而是思考如何通过改革使高考发挥出积极、正向的建设性“指挥”作用,把基础教育引导至正确的发展轨道上,这才是高考改革的“可为”与“应为”。一言以蔽之,“问题的关键不在于‘指挥棒’的有无,而在于基础教育会被‘指挥’到哪里去,‘怎样避免片面应试’这一问题才是关键。”^[6]理性全面地看待高考与基础

教育的关系,承认并直面高考“指挥棒”作用的双面性并对其进行客观的全方位研究,才能将高考与基础教育各自的长处充分结合,扬长避短,最大程度地发挥高考“指挥棒”对基础教育的正面“指挥”功能,成就教育的灿烂明天。

四、结语

基础教育是整个教育的核心所在,而高考作为连接基础教育和高等教育的纽带,肩负的重任不言而喻,高考与基础教育存在着天然的“捆绑”关系,决定着教育这一庞大系统的基因属性与发展形态。《高考与基础教育变革》一书将高考改革与基础教育变革共同放置于大的社会背景之中,通过讨论新一轮高考改革下基础教育产生的变革,来更清晰明了地认识高考与基础教育的关系,更客观全面地反思新高考与新课改,并且提出了高考改革要与基础教育变革相互观照、彼此适应、结合共进的观点。这就为当前的高考改革研究和基础教育变革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思路,启发我们从原本的狭窄视域与片面思维中跳脱出来,用一种社会学的结合眼光来审视高考和基础教育。但从反面来说,正是基于这样一种相对宏观的视角,作者是从整体入手去捕捉高考改革与基础教育变革的动向的,而并未明确具体改革举措间的对应因果联系,这么一来,微观层面的某些因素便在中无形中被忽视了,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此书的逻辑性。虽然《高考与基础教育变革》一书有不足,但我们更应该去关注它究竟给我们“带来了什么”,去深入思考观点背后的启迪与价值。

厘清高考与基础教育的本质关系是施行改革的逻辑起点与前提条件,将高考改革与基础教育变革结合起来观照是推进改革的必要选择与关键路径。可以说,高考与基础教育在深化自身改革的同时,展开双向互通的良性联动是改革的灵魂所在。应杜绝忽略基础教育变革实际的高考改革,也反对漠视高考改革动向的基础教育变革。高考改革与基础教育变革在一定的弹性范围内的“作用力”与“反作用力”有利于双方各自的发展,进而合力助推教育的进步。只有正视以上方面,高考改革与基础教育变革才能相得益彰,改革的终极目标才能得到实现。

参考文献:

- [1][19]刘海峰.高考改革:公平为首还是效率优先[J].高等教育研究,2011,(05):1-6.
- [2][8]李木洲.高考公平的元思考[J].国家教育行政学院学报,2012,(08):29-33.
- [3]王后雄,李佳,李木洲.高考公平的内涵及属性[J].中国教育学报,2012,(05):31-35.

[4]马晓娜.教育公平与人口规模控制的博弈——新形势下超大城市“异地高考”实施的困境探析[J].上海教育科研,2017,(08):5-8,74.

[5]李木洲.高考加分政策的变迁及问题透视[J].山东高等教育,2014,(07):65-71.

[6]张维平,高建京.自主招生的公平诠释:内涵、问题及发展策略[J].现代教育管理,2011,(07):12-17.

[7]黄乃祝,肖地楚.彰显教育公平 深化高考招生制度改革[J].中国高等教育,2013,(12):49-51.

[8][9]王长乐,杜朝晖.追求公平:或许正是高考陷入误区的根源[J].中国地质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03):86-90.

[10]周先进,张睦楚.高考改革:高中生综合素质评价的“可为”与“难为”[J].全球教育展望,2014,(07):101-111.

[11]沈启正.从西方国家的高校招生看我国综合素质评价与高考的融合[J].上海教育科研,2017,(06):5-8,37.

[12]边新灿.由考试到评价,由单要素到多要素——日韩和我国台湾地区高校招生评价体系演进逻辑研究[J].全球教育展望,2017,(07):21-30.

[13]余澄,王后雄.我国高考科目设置的发展历程及其改革价值取向[J].教育理论与实践,2015,(35):22-25.

[14]张雨强,顾慧,张中宁.普通高中高考选考科目现状及影响因素研究——以浙江省5所高中首批选考学生为例[J].教育学报,2018,(04):29-38.

[15]杜芳芳,金哲.新高考改革背景下高中生科目选择意向现状及对策——基于浙江省五所高中的调查分析[J].教育理论与实践,2016,(08):15-18.

[16]王森.新高考选考科目计分机制改进研究[J].教育科学,2018,(02):14-20.

[17]于涵等.关于改进新高考选考科目赋分方案的若干思考[J].中国高教研究,2018,(06):44-49.

[18]郑若玲.守护公平:高考改革的永恒依归[J].教育测量与评价(理论版),2011,(01):47-50.

[20]汪金元,汪龙.高考改革中的两难问题纵览[J].教育学术月刊,2009,(03):94-97.

[21]瞿振元.坚持科学选才与促进公平的有机统一——对深化高考改革的几点认识[J].中国高教研究,2014,(10):1-4.

[22]边新灿.公平选才和科学选才——高考改革两难价值取向的矛盾和统一[J].中国高教研究,2015,(09):27-32,62.

[23]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课程教学研究中心课题组.基础教育课程改革十年:经验、问题与对策[J].教育科学研究,2012,(09):5-12,17.

[24]郭华.新课改与“穿新鞋走老路”[J].课程·教材·教法,2010,(01):3-11.

[25]钟启泉,等.为了每一个学生的发展——新世纪中国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白皮书[J].全球教育展望,2001,(02):3-8.

[26]钟启泉.寻求课程范式的转型——中国大陆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进展与问题[J].比较教育研究,2003,(01):6-10.

[27]钟启泉.概念重建与我国课程创新——与《认真对待“轻视知识”的教育思潮》作者商榷[J].北京大学教育评论,2005,(01):48-57.

[28]张华.我国基础教育新课程的价值转型与目标重建[J].语文建设,2002,(01):4-6.

[29]靳玉乐.论基础教育课程发展的新理念[J].教育理论与实践,2002,(04):21-26.

[30]潘斌.论教育回归生活世界[J].高等教育研究,2006,(05):7-12.

[31]罗祖兵.从“预成”到“生成”:教学思维方式的必然选择[J].课

程·教材·教法,2008,(02):21-25,20.

[32]程良宏.作为教学哲学的生成性教学:可能价值与实践路向[J].教育发展研究,2016,36(18):59-65.

[33]张荣伟.“新教育实验”的责任与追求[J].教育发展研究,2011,33(24):47-52.

[34]王策三.认真对待“轻视知识”的教育思潮——再评由“应试教育”向素质教育转轨提法的讨论[J].北京大学教育评论,2004,(03):5-23.

[35]王策三.对“新课程理念”介入课程改革的基本认识——“穿新鞋走老路”议论引发的思考[J].教育科学研究,2012,(02):5-15.

[36]王娟娟,靖国平.教育“回归生活世界”:误区及本真探析[J].当代教育科学,2007,(19):3-7.

[37]周序.教育中的生活世界:从“回归”到“超越”[J].现代远程教育研究,2015,(03):19-26,64.

[38]郭华.评教学“回归生活世界”[J].教育学报,2005,(01):17-26.

[39]周序.生成性教学:教学当中会出现一种新的方法论吗? [J].课程·教材·教法,2015,35(04):44-50.

[40]郭元祥.大规模教育实验:意义与局限[J].教育研究与实验,2006,(04):68-72.

[41]成尚荣.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中国方案[J].中小学管理,2018,(11):23-27.

[42]宁连华,吕林海.我国基础教育新课程改革的十年审思与展望——基于历史定位、所获成绩与存在问题的探析[J].教育研究与实验,2012,(05):57-62.

[43]郝志军.基础教育课程改革反思与推进建议[J].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54(05):99-104.

[44]李康耀.“三维目标”的三个问题[J].教学与管理,2012,(07):38-39.

[45]魏宏聚.新课程三维目标在实践中遭遇的尴尬与归因——兼对三维目标关系的再解读[J].中国教育科学,2011,(05):36-39.

[46]王艳霞.新课程改革与“穿新鞋走老路”的社会学分析[J].教学与管理,2013,(10):37-38.

[47]殷学明,姜晶.生成性教学改革得失论[J].河北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17,(03):110-115.

[48]庞君芳.浙江省基础教育课程改革回顾与展望[J].教育研究,2018,(10):154-159.

[49]赵晓飞.基础教育变革的突破口在于高考的改革[J].前沿,2004,(04):89-91.

[50]教育部基础教育司.走进新课程——与课程实施这对话[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187.

[51]刘丽群.教师的教育观念是如何转变的——兼论教师培训的应然取向[J].教育科学研究,2007,(04):54-57.

[52]蔡可.新课改:尚未完成的教育启蒙[J].北京大学教育评论,2013,(04):51-62,186.

[53]刘博智.高考改革“牛鼻子”牵动教改“牛身子”[N].中国教育报,2016-1-30(01).

[54][55][57][58][59][61][62]周序.高考改革与基础教育变革[M].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17,161,56,132,63-64,64,184,186.

[56]Stigler, J.W., Hiebert, J. The teaching gap: Best ideas from the world's teachers for improving education in the classroom[M]. New York: Free Press, 1999: 11.

[60]周海涛,景安磊.新高考改革助推教育升级[J].教育研究,2015,(08):91-97.

(责任编辑:刘君玲)